

论马瑞戴尔·勒苏尔《女孩》中的 交叠性身份叙事

韦清琦 刘丹丹

【摘要】 马瑞戴尔·勒苏尔是美国左翼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其创作为当今世界文坛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勒苏尔的小说《女孩》是一部有关身份叙事,构建以“姐妹情谊”为纽带的女性共同体的作品。小说以经济大萧条时期边缘女性群体的叙述为主线,其叙事声音中透出权力之间的交锋,揭露了男权统治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展现出边缘女性群体的反抗和对身份的诉求。不仅如此,小说关注性别、阶级与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交叠性与融合性,这超越了单一的“女性共同体”信念,展现出边缘弱势群体寻求团结一致、突破重围、寻找自我身份的努力。

【关键词】 马瑞戴尔·勒苏尔;交叠性;身份叙事;姐妹情谊

马瑞戴尔·勒苏尔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左翼女性作家,其创作关怀以工人阶级女性为代表的边缘群体,用悲悯的情感书写着经济大萧条时期无产阶级女性生活的无助与脆弱。《女孩》(*The Girl*)虽写于1939年,但因其激进的女性主义观念,直至1978年才出版。这部小说被拒绝的理由并不难猜测,正如科纳所言:“勒苏尔作品的编辑大多数是男性,他们不仅不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相反,质疑勒苏尔的创作实力并对之大放厥词。”^①在小说《女孩》中,勒苏尔将叙事重点集中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姑娘身上。女主人公的“无名”象征了大萧条时期众多底层女性身份的极端卑微。边缘女性群体在社会中无法得到身份的认可,而在勒苏尔看来,拯救她们的出路在于女性集体主义,即女性共同体的构建。同时,勒苏尔的创作表现出深刻的交叠性社会批判意识,她高度关注性别议题及其与环境、阶级和种族间的密不可分的交叠性互动,从而将多元化、多谱系议题纳入批评视野中。女性身份的构建与认同是勒苏尔创作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勒苏尔对女性身份特有的解读。她能够从性别出发,将悲天悯人的情怀发散到类似的弱势群体地位的改善问题上,其中性别与阶级的交叠就是很典型的议题。勒苏尔因此或可位列较早从事深入的交叠化性别书写的美国文学家之一。

韦清琦,文学博士,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1189);刘丹丹,文学博士,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南京211170)。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族裔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21&ZD28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北美左翼环境文学书写的译介与研究”(4017002307)、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金项目“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马瑞戴尔·勒苏尔文学创作研究”(2022BSKY05)的阶段性成果。

^①C. Coiner, *Better Red The Writing and Resistance of Tillie Olsen and Meridel Le Sue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9.

本文试从小说《女孩》中无名女主角的经历谈起,评述她在三个女性朋友“ABC”即艾米莉亚(Amelia)、贝尔(Belle)、克莱拉(Clara)的帮助下实现女性成长的历程。小说围绕女性之间的话语展开身份叙事,阐释边缘女性群体的经验,呈现出其对身份的诉求。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女性只能屈居从属地位,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包括其对女性个体身份的压抑。而以勒苏尔为代表的左翼女性作家对边缘女性群体生存现状的真实记录,不仅以现实主义手法保存、还原了边缘群体的真实身份,在某种层面上她的书写策略也成为女性反抗的武器和寻找身份的途径。在交叠性理论透镜的审视下,我们发现勒苏尔在作品中勾勒出中心与边缘之间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符号系统,如男性与女性、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白种人与有色人种等。

一、身份空白:身份缺失的诉求

边缘群体女性身份不仅包括女性的性别身份,还包括同处劣势地位的阶级属性,即无产阶级的草根身份。勒苏尔善于揭示统治者/强势群体与被统治者/弱势群体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往往以交叉纵横的网络状结构隐隐展开,从而构成了更深重的压迫。勒苏尔在关注女孩生活故事的同时关注动物,便为鲜明的例证,边缘群体女性与动物遭受的悲惨命运在根源上的相互关联性,在勒苏尔笔下又是如何彼此扶持、融为一体,我们将在后文中详述。最需要勒苏尔关注的,当然还是下层社会的女性。

这些以“无名”作为最显著特征的女性,在历史记录中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她们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几乎是缺席的,是男权统治社会中的“隐形人”。“隐形”或“无名”,意味着被遗忘、被忽视,甚至被涂抹、被删除,其社会身份与地位长期处于被压迫被支配的状态,也促使这些“无名”之辈勇敢发声,通过各种策略来达成寻找缺失身份之路。并且,她们的身份诉求形式随着时代发展而更加多元化,以期借此重构真正的社会身份。

勒苏尔关于女性身份空白叙事的交叠化观点,可以通过其作品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得以再现。她在小说《女孩》中通过叙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揭露出性别歧视与压迫已成为阶级对立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二者密不可分且相互强化。而关于上层阶级女性对下层阶级女性的压迫,勒苏尔不但没有回避,反而将性别与阶级两个维度交叠起来。因此,《女孩》颠覆了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对传统无产阶级小说的定义。小说以上层阶级男性对边缘女性的压迫和奴役为叙事起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边缘群体女性从反抗阶级压迫到构建女性集体主义意识最终形成的历程。贝尔对于女性生活现状有这样一段描述:

这是一个恶臭的社会,对女性来说更加糟糕,男性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员工整日监视着女性,女性每天不得不像老鼠一样彼此依靠在一起生活。^①

对阶级和性别的关注,揭示了工人阶级女性被排斥于男权统治社会之外的事实,她们承受着上层阶级女性和全体男性的双重压迫。如果说男权统治社会对上层阶级女性是无情的,那么它对下层阶级女性的压迫则变本加厉。而女性讲述自身经历的过程是走出边缘角色、获得话语权并达成身份诉求的重要途径。正如卡塞尔(Justine Cassell)所言:“叙述是人们决定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构建自身的社会身份,并对自身的生活保持的某种观点,反抗那些更为强大的他者压制这种看法的意图”。^② 在身份失

^①M. Le Sueur, *The Girl*, Minneapolis: West End Press, 1982, p. 10.

^②J. Cassell, “Storytelling as a nexus of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nd technology: A feminist approach to software design”, in J. Cassell & H. Jenkins (eds.), *From Barbie to Mortal Kombat: Gender and Computer Gam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pp. 298 – 327.

语的社会里,勒苏尔认为孤立的存在只会使社会环境更加糟糕。这就如同不少女性主义文论家喜欢提及的典型意象——“百衲被”——的集体缝制,百衲被是姐妹情谊的实物标志,是女性团结一致的感情象征,它将分散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女性在集体中获得社会身份的认同感是其自我解放的重要标志。百衲被是一种话语工具,书写了女性的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点,体现出女性的团结协作与集体智慧。正因为如此,女性集体主义的意义非同小可。勒苏尔的书写使边缘女性群体的真实身份得以保存,因而,作者在旗帜鲜明地反对性别歧视的同时,对边缘女性群体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在她看来,以下层女性为代表的边缘群体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应紧密团结在一起。

第一人称是小说《女孩》的主导叙事声音,这种叙事方式触发了读者对叙事的认同,并从叙事者的视角体现出男权统治社会的荒谬与残酷。在百年前的美国父权统治的社会,她的书写并不讨巧,需要极大的勇气去揭示真相。正如娜塔莉·维金蒂诺(Nathalie Virgintino)所述:“勒苏尔用文字揭示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向读者展示了女性生活现状。她揭露了女性在生活中遭受的折磨、日常生活上受到的虐待,以及从怀孕到绝育的惨状,即使在当时最左翼的女性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有这样的描写。”^①的确,勒苏尔讲述的故事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上层阶级对边缘群体的双重压迫,同时也能体会到在男权意识建构的巨大话语空间中,被压迫的边缘群体是如何努力突破重围,试图构建自身的身份话语的过程。

小说一开始,叙述者“我”便能够有力地映射出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压迫。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份工作,很幸运克莱拉教我如何走在街上而不被警察抓住。克莱拉告诉我,他们会带你做检查,带你去做绝育手术,或者把你送到女子监狱。”^②作品通过叙述者见证社会对女性群体压迫的同时,又间接赞颂了边缘女性群体的集体主义精神:

我喜欢和克莱拉在一起,听她讲故事,现在又喜欢和贝尔在一起,她和丈夫霍克以及她的弟弟阿克一起经营着德国村。

我尽可能的靠近克莱拉,她内心有种自信,仿佛她知道我永远不知道的一切。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去,我能从镜子里面看到她的后脑勺,就像灌木丛中的狐狸。

我看见艾米莉亚把沉重的袋子放在肩上,袋子似乎从她的肩上滑落下来。女孩,她对我说:“我有六个孩子,是的,六个。”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看不到的可怕痛苦,是一种我能从母亲眼睛里看到的痛苦,尽管她什么都没说……

我累了,太累了,我把头靠在胳膊上,我能看到布茨那狐狸脑袋正靠过来听甘茨说话。^③

故事开头部分反复出现的“我”呈现出勒苏尔早期作品中极少出现的叙述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通过第一人称视角邀请读者更直接地参与叙述经验,从而更真实地展现出她一再目睹的现象,并反复回溯有相似经历的事件。我们需跟随自身的感知,去理解与觉察边缘女性处于被支配的状态,因为它“在重复的波浪中向读者走来,沉积了一些信息,然后退去,再次向前涌动,沉积了更多一点”。^④这种反复重复与不断叙事的方法与小说主题息息相关。叙述者试图通过文学书写填补女性身份的空白,并争取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小说的言说方式。貌似繁复的书写形式或为勒苏尔表达主题内容的一种策略,凸显出她对女性身份缺失问题的强烈关注。而这并非个例,勒苏尔笔下的女性有很多因遭受压迫而团结在一起,从集体性到左翼政治斗争的自觉性,便在她的这种独特

^①N. Virgintino, “Community, body and the female experience in Meridel Le Sueur’s *The Girl*”, *The Quint*, Vol. 6, No. 1, 2013, pp. 108 – 127.

^②M. Le Sueur, *The Girl*, p. 1.

^③M. Le Sueur, *The Girl*, pp. 1, 5, 7, 8.

^④F. Jussawalla (ed.), *Conversations with V. S. Naipaul*, Mississippi: Mississippi UP, 1997, p. 147.

书写方式中展开。

在出版小说《女孩》之前,勒苏尔对小说进行了大量修改。尤其是在故事结局部分,她将女孩的新生儿的性别从男性改为女性,并为其取名为克莱拉,以此来纪念逝去的好姐妹。此番修改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女孩的下一代从此有了名字,象征了边缘女性群体在追索缺失身份的斗争道路上已有了初步进展,小说中的女性叙事者由此展现出权力的博弈与交锋。作为无产阶级工作者的艾米莉亚发出了小说中的变革声音,她能近距离地接触无产阶级领导的阶层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她的每次出现都不乏关于女性身份空白的谈论:“宝贝,不要害怕,现在你就是创造者。你将有个很棒的孩子,可爱的男孩或女孩,这个时间马上就快要到了,抱着希望吧,医生马上就会到来,我们那天见。带着希望,工人阶级联盟会将在明天举行。”^①艾米莉亚满怀激情的宣言无疑代表了勒苏尔在文学创作中、在小说感人的对白中激发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觉醒意识和变革动能的意图。

勒苏尔之前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写作为《女孩》铺平了道路并奠定了基础,她在这些准备性写作活动中已经开始塑造与“女孩”类似的形象,例如在小说《靠救济生活的女人们》(*Women on the Breadline*)中勒苏尔为改变边缘女性群体身份空白的现状而发声。一个来自农场的女孩在城市里生活了好几个月,身无分文,噤若寒蝉,沦为沉默的他者,甚至胆小到连排队领取救济金都不敢。在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时期,很多女性都处于类似的困境,她们担心失业,因饥饿而晕倒在大街上的情况屡见不鲜。她们被排挤在救济队伍之外,没有援助、没有保障、没有失业金、没有解雇金,甚至没有身份。男权统治的社会包含对女性身份的涂抹,在上层阶级的视角中,身份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有了自身的历史,能够展现自我的独特性,并对统治具备了间接的威胁性。而勒苏尔所论述的底层女性所遭受到的来自同一阶层男性的排挤,其意义在于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应探讨个体生存的问题及解决途径,还应将多元维度如阶级、性别、环境和种族纳入视野,讨论其间的交叠状态,由此引出人类社会问题的整体统一性,并作为社会和精神秩序变革的希望之源。

男权统治的社会将边缘群体规训为顺从的、顺服的身体,女性的身体并非属于个人,而是公共财产,深受社会的各种制约,这使得女性所遭受的统治被布控在社会网络的各个角落,并在自己的身体上得到集中体现。正如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指出的:“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②在勒苏尔笔下,人物的身体暗示着不同的代码,在解码的过程中,边缘群体的身体是被压制与被控制的,身体与心灵是相互背离的,身体隐喻既揭示交叠化的现状,又暗示了潜在的交叠化的斗争能量。《女孩》中女性与动物之间存在的诸多共生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动物的悲惨命运隐喻出女性的悲惨境遇;女性与动物沦为他者,无法拥有选择权力。如贝尔在探讨自己的流产经历时说道:“花10美元,医生会将一个巨大的兽医针扎在你身上,后续的操作流程则需要个人独自完成。”^③女性在流产时使用的针与动物使用的针一样,勒苏尔运用这个细节将女性与动物的命运紧密交叠在了一起,真实地记述了女性与动物同受压迫的现实境地,这样的描述进一步说明边缘群体女性处于身份缺失与空白的境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许多评论家和左翼人士却批评道,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勒苏尔不应该探究这样的社会问题。然而勒苏尔在小说中捕捉到了社会境况的复杂性,以及边缘女性群体遭受的饥饿与贫困等社会问题。勒苏尔在小说中积极为她们呐喊的同时,指出她们的解放道路或许在于不断寻求同盟力量,团结所有的边缘群体,进而解构那个压迫着所有弱者的交叠化的中心统治者。

^①M. Le Sueur, *The Girl*, p. 10.

^②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③M. Le Sueur, *The Girl*, p. 54.

二、身份话语：讲述即见证的保存

在勒苏尔的创作中,讲述是探索生活、见证社会的方式,而叙述者几乎都是边缘女性,她们通过自身的故事揭露着社会中不同寻常的隐蔽意义。卡塞尔指出,“叙述是对生活保持的一种观点,并决定着自己想要构建的社会身份,并抵制上层社会对自身的压迫。”^①勒苏尔的文学书写大多是为没有发声渠道与表达机会的边缘群体呐喊。边缘女性群体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发声的机会,她们在讲述自身经历的过程中,试图通过走出困境寻找自身的社会身份,进而获得话语权。

边缘女性群体的声音是小说《女孩》的主导叙事声音,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触发边缘群体对叙述者观点的共鸣,并从叙述者角度感受男权统治社会的荒谬与压迫。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下,这样的写法却未被看好:“勒苏尔的小说《女孩》因其对男性、女性刻板生物决定论的宣扬和经济大萧条时期明尼苏达州不恰当的阶级分析而受到指责。”^②而这种本应自觉成为社会良心的监督者、来自文学批评界的声音,恰恰讽刺性地成为勒苏尔的社会写实的佐证。她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是她亲身观察到的人群,与她休戚与共,如在救济站、在街上、在事业管理局认识的姐妹们。她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她们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亦没有讣告,只有勒苏尔通过文字来为她们树碑立传。

由于自身的女性身份以及善解人意的情怀,勒苏尔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边缘女性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洞察出上层阶级的卑鄙丑恶。她笔下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或与她一起生活,或是她的熟识。这一创作体验使读者似乎能够亲身经历边缘群体女性不仅遭受男性的压迫,还遭受上层阶级女性的压迫——承受着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压迫。勒苏尔笔下的女性发出或强或弱的呼声,这些呼声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女性表达。小说《女孩》关于女性的身份话语,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从微弱的女性之间“传递字条”、强烈的身体反抗到集体主义呐喊的爆发。

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女性从属于男性,处于男权统治社会中的边缘地带,男性通过权力运作对女性身份进行抹除并剥夺其话语权,压制女性的思想,将女性置于沉默的边缘地位,而与之相对应的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论述的‘第二性’。”^③在女性身份遭到压抑的男权社会中,见证讲述女性边缘群体以及对这一叙述的保存,其意义非同小可。她们的讲述使其真实身份得以保存,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既是她们的生存策略,也是她们的战斗武器。在《女孩》中,无名女孩被政府强迫要求做绝育手术,反映出女性在男权统治下的悲惨遭遇。关押途中,无名女孩遇到了聋哑女孩爱丽丝。其间无名女孩与聋哑女孩通过互相传递字条的方式交流,也通过传递字条这种方式发出无声的反抗。尽管只是通过书面勉强发声,但这对长期处于失语、压抑状态的边缘女性来说,意味着她们开始尝试拿回话语权,重构社会身份。在此,“字条”的意象已超越了这个“小动作”本身,而代表着斗争的一个起点。这种无声的反抗反映出女性对男权统治社会的抵制以及对男性主导话语权的质疑,也是女性边缘群体为书写、构建自身话语权的一种积极尝试。

勒苏尔在《女孩》中为重构女性身份话语作出了多种努力。故事中边缘女性群体面临一系列生存困境,如她们担心失业,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失业金,甚至没有解雇金,她们被排斥在被救助的队伍

^①J. Cassell, “Storytelling as a nexus of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nd technology: A feminist approach to software design”, pp. 298 – 326.

^②C. P. McIntire, “Dying of consumption: The prostitute Clara in Meridel Le Sueur’s *The Girl*”,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Vol. 22, No. 2, 1999, pp. 1 – 10.

^③李银河:《女性主义》,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2页。

之外。在工人阶级女性领导者的带领下,她们不再是沉默的他者,不愿隶属于男性,并对男权统治的身份话语提出抗议。她们在无产工作者艾米莉亚的引导下意识到反抗所蕴含的力量。在小说第三十四章的中间部分每段的开头几乎都是相似的,“克莱拉说,贝尔说,艾米莉亚说……”。^① 这种多重声部的交叠与融合汇聚成女性群体反抗男权统治的有力武器。边缘女性群体是男权统治社会灾难的见证者和幸存者,她们的讲述充满着力量,因此能够获得读者的共鸣与关注。

将反抗行动推向高潮的导火索则是克莱拉的离世。艾米莉亚倡导边缘女性群体为克莱拉的死举办抗议活动,一场审判与一场控诉让整个城市都能听到她们的声音:“克莱拉死了,是谁杀死了克莱拉?她是一个罪犯吗?她是一个恐怖人物吗?谁杀死了我们?”^② 女孩儿们通过强烈的抗议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象征着女性力量的兴起与传承,打破了女性依附于男性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僵局,并采用游行、罢工、示威等一系列抵抗形式进行斗争,喊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以姐妹情谊为基础构建女性共同体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重要关键词,“也是女性文学乐于构建的理想国,它的动因在于女性作家、批评家争取女性团结以获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反抗压迫的实际。”^③ 勒苏尔在小说《女孩》中生动地刻画出姐妹之间的情谊。无名女孩、贝尔、克莱拉、艾米莉亚等边缘女性在经历一系列事件后,逐渐意识到造成她们悲惨命运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拯救女性的唯一方式是联合在一起,共同反抗社会的不公。小说最后新生儿的出生也将故事叙述推向了高潮:女孩将刚出生的女儿取名为克莱拉,以此来纪念自己刚刚逝去的同名姐妹。因此,小女孩的出生便有了象征意义,她将女性同胞集结在一个阵营中,以期在新的轮回中实现自由与平等。女性共同体的构建是实现女性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在面临压迫时,姐妹情谊的构建是共同抵抗男权社会不公的一种抱团取暖的方式,是女性获得话语权与身份必不可少的部分。

在《女孩》中,勒苏尔将叙事重点集中在一名无名女孩身上,她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拯救边缘女性群体的唯一出路是女性联合在一起共同反抗社会的不公。在叙事方法上,勒苏尔运用“我们”与“我们的”来呈现其对女性集体主义的认可,并运用对话来表达共同的集体主义经验。例如怀孕的无名女孩遭遇一场抢劫案,孩子的父亲布茨被杀时,女孩因目睹这一切而情绪奔溃。此刻无产阶级工作者艾米莉亚安慰道说:

你要有孩子了吗?她微笑时脸上布满了皱纹。

是的,我说。

她说,你会有一个孩子,然后你将属于整个社会。

我看着她。她似乎是第一个为之高兴的人。

我感到孤独,我说。

为什么,你现在并不孤独,她笑着说。现在试着独处,她很快就会像小猫一样踢来踢去。哈,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你必须笑。她盯着我看,摸着我的胳膊。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说,你不能把人们分开,也不能让我们感到痛苦。

但是,看!我们都在这儿。^④

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尽管边缘女性遭受身体虐待与饥饿,但她们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心理与情感上互相鼓励与支持彼此,从而获得精神力量。这种集体主义书写在勒苏尔的文学创作中比比皆

^①M. Le Sueur, *The Girl*, p. 123.

^②M. Le Sueur, *The Girl*, p. 146.

^③魏天真:《“姐妹情谊”如何可能?》,《读书》2003年第6期。

^④M. Le Sueur, *The Girl*, p. 112.

是,再现了左翼女性作家对边缘女性群体的关注及对女性解放途径的思考。在小说讲述到克莱拉生命的尽头时,为了彰显女性集体主义,勒苏尔在写作中将所有边缘群体女性和克莱拉聚集在一起,这与男性代表布茨的孤独死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勒苏尔号召工人阶级女性必须联合起来走向集体主义,而这种集体主义意识是她们寻找生命意义的力量与源泉,是其在男权统治社会中获得社会身份话语不可缺少的武器。勒苏尔向读者呈现出边缘女性群体生活的境遇,揭露出在经济大萧条的社会背景下,边缘女性群体如何构建女性集体主义,共同反抗男权统治社会的不公,并最终重构女性的社会身份与话语体系。如芭芭拉·弗莱(Barbara Foley)所言:“女性作家对革命性社会话语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她们的身份重构和自我表现。因此,性别意识是一种崭新的、集体的、自我发展的意识,一种通过自我身份多重延伸而获得的意识。”^①弗莱的描述很适合评价小说《女孩》——勒苏尔坚持女性作家的社会责任,向读者展现了女性的生活现状,揭示了女性边缘群体如何在困境中构建女性集体主义、共同反抗男权统治、重构女性的身份与社会地位。

三、身份叙事:寻找身份的重构

包括《我听见人们在谈论》(*I Hear Men Talking*)在内,勒苏尔在文学创作中经常塑造女性叙述者,边缘女性群体通过倾诉自身的故事,书写着她们在男权统治社会中的独特生存方式。勒苏尔在创作中关注女性问题,从边缘女性群体入手探究社会中女性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她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打破社会中存在的性别、阶级、种族等方面的不平等,改变人们对女性传统的刻板印象,成为美国文坛无法忽视的声音。她将被抹去的女性形象栩栩重现,从而促进了男性霸权文化格局的改变。而交叠性理论一开始就与女性主义、阶级平等、族裔研究等密不可分,有助于拓宽相关研究发展口径并使之相互裨益。交叠性是一种概念框架,它的出现是用于识别和描述身份的不同方面发生“冲突”时的情形。构成总体的身份部分可以是性别、种族、阶级、族群、性取向、宗教、年龄、精神或身体残疾等。与之相应的是,权力对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不公正对待,也基于一个多维度的基础,并且这些压迫维度相互关联,构建出一套具有交叠性的压迫系统。这在勒苏尔的小说书写,尤其是人物塑造中也多有体现。

勒苏尔塑造了许多身份各异但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如《女孩》中可怜但从未对生活放弃过希望的无名女孩;《靠救济生活的女人们》中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艰难生存的失业妇女;《我听见人们在谈论》中的佩内洛普,她是一位心胸宽广的年轻女性,并试图构建起激进的女性社会身份;《冬季草原女人》(*Winter Prairie Women*)中挣扎在边缘地带的女性群体,她们同时面对着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身处寒冷的冬季草原,需要解决饥饿和生育问题,并消除对强奸和不育的恐惧,尤其是女主人公——又是一位无名女孩——最终也加入了穿越大草原的妇女队伍。在这些创作中,勒苏尔既塑造了众多在底层社会中困苦并迷惘的女性,也客观描述了其中一些女性的虚伪与愤怒。显然,无论站在何种角度,这些书写方式都展现了勒苏尔对女性身份特有的解读,而女性身份的定位与认同是勒苏尔作品中呈现出的一个重要内容。

性别与身份的交叠影响着边缘群体女性。在《女孩》中,勒苏尔将叙事视角聚焦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无名女孩身上,她一文不名,这种贫困彻底得使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只能用“女孩”这个词作为指称。无名女孩象征着经济大萧条时期所有弱势女性极其卑下的地位,她经历了一系列的悲欢

^①B. Foley, *Radical Representations: Politics and Form in U. S. Proletarian Fiction, 1929—194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37.

离合,目睹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劳动妇女给予的帮助。小说通过女性视角探索男权统治的社会,其中包括女主人公在她的三位女性朋友即艾米莉亚、贝尔、克莱拉帮助下实现女性成长的历程。小说书写着清一色的女性共同体,女性共同体的构建将单独的女性个体结合在一起,她们在集体中获得力量与存在感。而在身份重构的过程中,女性身份认同及女性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认可、保护与持续。

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对勒苏尔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身份重构有着重要影响。勒苏尔对女性身份重构的叙事,都是通过作品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完成的。而交叠视角清晰地展现出文学人物形象不存在扁平个体,每个人都存在多重身份的交叠与集成,这实际上增加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维度、意趣,而且与生活靠贴得更为真实、紧密。^①英国学者萨曼莎·沃尔顿(Samantha Walton)在谈到“自然疗愈”(the nature cure)时指出,“这一过程必须是交叠性的,如要切实探究身心疾患的原由,以及康复治疗所处的语境,那就需要考量诸如种族、财富、社会阶层、性别、残疾等各种因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②需要指出的是,沃尔顿提出的整体性疗愈策略与中医的整体观又有所不同,她强调的是人在社会正义基础上所获得的整体性关爱对健康的重要意义。小说《女孩》中无名女孩谋求的身心疗愈,正是这种交叠性的整体化治疗才能带来的关爱和纾解。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是社会的主体,女性则是客体,处于边缘地位。而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中,人类是主体,动物则沦为他者。因此,女性与动物有着更紧密的类比关系,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动物的奴役有着相似之处,动物的命运隐喻出女性的命运,女性与动物都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女孩》中的女性与动物之间有着交叠共生的关系,动物的悲惨命运隐喻出女性相似的悲惨命运。小说中用含有贬义动物词汇描述女性形象的例证有很多,如“克莱拉笑着从我身边走过,她的小嘴像一只饥饿的兔子,从我的身边喊道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贝尔说这是一个恶臭熏天的世界,对女性来说更糟糕,人们不得不像老鼠一样生活;克莱拉点了点头站起来,我打开了们走下楼梯,看着那张瘦长脸像狐狸一样。”^③在这些描述中,女性分别被比作兔子、老鼠和狐狸等动物形象,而此类形象在人类文化中往往被认为是低劣的动物。无疑,这样的描述会进一步将女性边缘化。这种象征意义的关联也进一步表明,女性和动物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屈从、被动、受驱使甚至任人宰割的地位。

因此,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勒苏尔号召被压迫的群体甚至非人类个体应联合在一起,共同反抗社会的不公。在小说《女孩》中,勒苏尔向读者展现了经济大萧条中边缘女性群体的生活现状,她们共同反抗男权统治社会的不公,构建女性共同体,重构女性的社会身份。尽管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边缘女性群体遭受身体虐待、饥饿与绝望,但她们在精神与心理上相互支持与依托。勒苏尔在创作过程中坚持女性作家的社会责任即重构女性身份叙事,叙述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勒苏尔笔下的女性各有特点,她并没有迎合男权社会的好恶去塑造女性角色。与之相反,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各异,有的坚强、有的无私、有的脆弱。即使在描述贝尔和克莱拉以卖淫为生时,勒苏尔也没有进行批判,而是进行了反问,“在经济大萧条的社会背景下,如果卖淫是获得充饥食物和温暖住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唯一途径,那么像克莱拉和贝尔这样的卖淫是犯罪吗?从事卖淫活动是不道德的吗?”^④在这里勒苏尔呼应了美国早期女性主义者如苏珊·安东尼对卖淫女的同情。她对女性身份的真实重构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深刻理解,加深了其作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

① 韦清琦、李家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交叠性研究思想的范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年第2期。

② S. Walton, *Everybody Needs Beauty: In Search of the Nature Cure*, London: Bloomsbury Circus, 2021, p. 31.

③ M. Le Sueur, *The Girl*, p. 4.

④ N. Virgintino, “Community, body and the female experience in Meridel Le Sueur’s *The Girl*”, p. 113.

勒苏尔笔下的女性形象各异且均源于现实生活,而非虚构想象,其创作是一种对女性真实身份的叙事与重构。她在《女孩》中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以男性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呈现出与男性作家不同的叙事风格,并在创作中重构女性人物形象,凸显出她创作中蕴含的女性共同体信念。无名女孩曾在小酒馆做女招待,在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的一段时间中,她耳濡目染了非法流产、性暴力、饥饿、未婚生子等一系列社会现状,酒馆女主人贝尔向女孩述说着自己惨遭丈夫的虐待,甚至经历过十三次流产。^①在小说中,勒苏尔对无名女孩、克莱拉、贝尔和艾米莉亚等边缘女性群体的生活和情感经历进行了真实描写。尽管她们都经历着悲惨的命运,但她们仍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呈现出无名女孩在女性共同体的影响下实现阶级与性别意识觉醒的过程。勒苏尔在作品中重构了女性身份的多面性与多样性,以此强调女性身份解放与地位提升的重要性。

勒苏尔对女性运动持有肯定的态度,这是理解其作品的重要背景,表明了她欲通过书写来对女性身份进行重新认定与建构。通过对现实身份的政治诉求与文本形式之间不断地磨合与调整,打破男权社会对女性作家传统文化的偏见,塑造更加真实的女性形象,重构女性身份意识。作者通过边缘女性群体的论述,揭示出男权统治社会的层层面纱,在朝不虑夕的局势中、在黑暗社会的牵制下,边缘群体女性从女性集体主义中寻觅出希望之光。她们的身份重构叙事展现出男权统治社会下边缘女性群体生存的策略,勒苏尔通过文字帮助边缘女性群体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在创作中重构女性身份地位,从而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力。

四、结 语

作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勒苏尔思想激进,她的创作关注性别、环境、阶级、种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出对边缘群体的交叠性体察。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与其他许多左翼女性作家一样,勒苏尔并未获得应有的文学地位。但她笔耕不辍,以宏阔的艺术视野呈现了对阶级、女性、环境和种族议题的交叠性关怀。她在创作中展现出的情怀始终与她所聚焦的边缘群体同气连枝,坚定地扎根于左翼阵营中,这反映了作家世界观和创作观的根本基调。在经典文学阐释中,勒苏尔的作品被置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现实语境,愈发显现其作品主题的典型性与人物刻画的深刻性。《女孩》中的“无名”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不断的骚扰、恐慌、人情冷暖后,最终被无产阶级女性拯救而走出困境。勒苏尔在其文学创作中借助讲述女性故事来阐释阶级与性别压迫,其中的身体叙事更是女性“亲历”生活的独特体验。小说家通过对性暴力、流产、未婚生子等女性遭受的种种身体创伤的描写,“把妇女工人阶级的历史性置入妇女生产的身体……女孩在欲望的母性身体中聚集了阶级意识。”^②在30年代男性文学占据主流社会的文学场中,勒苏尔的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经典的女性工人阶级形象。

作为左翼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勒苏尔的女性身份叙事根植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将女性的语言、身体和行动交叠在一起,打破陈规,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经典女性形象,其中既有底层社会中迷惘而困苦的边缘群体女性,也不乏虚伪与伪善的中产阶级女性。而身份叙事是勒苏尔作品中呈现出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自身的身份,勒苏尔对边缘女性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具有敏感的意识,她不仅创作出许多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诗歌等,还通过演讲和发表相关评论来论述对边缘群体女性问题的关注,这一书写手法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她独具特色的创作视角始终围绕着阶级、性别、环境、种族等议题而展开,而在这些叙事中,女性主义身份叙事学正逐

^①M. Le Sueur, *The Girl*, p. 10.

^②王予霞:《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渐走在交叠性与整体性的道路上。关于勒苏尔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女性的身份叙事、还是阶级批判以及环境书写,乃至种族身份话语都是当下的热点话题,而重塑经典,挖掘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议题对于文学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有助于构建更加多元化的女性形象与更加坚实的身份叙事。

从叙事策略上看,勒苏尔的写作为交叠性阅读视角提供了一种典范。实质上,无论是讨论女性还是男性,我们都在揭示所有强、弱势群体之间复杂性、交叠化的权力角逐的现实,由此我们从单一的性别问题走向了统摄性的问题意识。通过探究勒苏尔文学创作中的书写手法与文本表现形式,可以发现其创作手法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即使以晚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重新审视近百年前勒苏尔的文学创作,她的左翼思想也不仅不过时,甚至仍是今后女性环境写作的主旋律,她的书写仍然值得走在时代最前沿的作家和批评家借鉴。勒苏尔在中国学界也很有影响力,并得到了相当正面的接受。诚如学者张莉所指出:“勒苏尔的代表作《姑娘》(*The Girl*)体现了左翼女作家建构纯粹女性共同体的努力。”^①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场考察勒苏尔的作品,我们不但认同其左翼进步性,还能够以中国独特的视角审视、梳理美国文学史,指出其经典性的流动与重构的种种可能,从而为我们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贡献自身的声音、见解和立场。

(责任编辑:张 开)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Narration in Meridel Le Sueur's *The Girl*

WEI Qingqi, LIU Dandan

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n left-wing female writer and an influential promoter of American proletarian literature, Meridel Le Sueur has left valuable legacy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Le Sueur's novel *The Girl* is a work about identity narration, focusing on the pursuit of building a female community with “sisterhood” as the bond. The novel takes the narrative voice of marginalized female group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s its main thread, reflecting the power struggl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further exposing the oppression of male-dominated society on women, while also showcasing the resistance and aspirations of marginalized female groups for identity. Moreover,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inseparable intersectionality and integration among gender, class and the environment, portraying the belief in “female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in which marginalized female groups might have a chance to transcend the single issue for warmth and support, striving to unite,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set by capitalism and patriarchy, and finally to rediscover their own identity.

Keywords: Meridel Le Sueur; intersectionality; narratorial identity; sisterhood

About the authors: WEI Qingqi,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8); LIU Dandan, PhD in Literature, is Lecturer at Jiangsu Maritime Institute (Nanjing 211170).

^①张莉:《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共同体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8年第4期。